

调房轶事

陈建兴

调(换)房子,这样的事现在几乎闻所未闻,可在上世纪70年代,却是普通上海人改善居住条件的有限选择。

那时,马路上时常会看到手拎糍糊桶的人在电线杆上张贴调房启事。这些启事大都写明自家房屋的情况,希望调换的房子的要求,并留下联系方式。

我家前弄堂的邻居老汪在秀水路一家木器厂上班,家里孩子大了,要将居住的大房子,换成两处小房子,当时叫“一调二”。他知道我在弄堂里出黑板报,字写得端正,便去曹家渡战斗文具店买来几张蓝印誊写纸,让我帮忙写调房启事。我也不清楚怎么写,就去马路上看了许多别人贴的启事,回来再着手写。先打草稿,问清他家房子的面积、朝向、房屋性质和对人家的要求、联系地址等,再写定稿,最后才正式誊写。我用仿宋体一笔一画地写,底下垫着三张蓝印誊写纸。但第一第二张还算清晰,第三张就有点模糊了,而且这样手工誊写的速度太慢了,我便又去单位里借来了钢板、铁笔和蜡纸,改用刻的,一下子刻了100多份。大功告成,我把启事送到老汪家,他高兴极了,请我到华阳路口的华五伙食店吃了一碗阳春面。接下来我帮忙帮到底,再帮他去电线杆上贴启事。他推出那辆“老坦克”,我拎着盛满糍糊的铁皮罐,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每条马路的每一根电线杆都贴上了。看到人家调房启事上有符合老汪心意的房源,他也会让我摘抄下来。启事也确实蛮多的,“一调一”“一调二”“二调一”,什么都有。

半个多月后,有人约老汪面谈了。老汪喜出望外,不抽烟的他也买了一包“万宝路”塞在上衣口袋。他叫上我,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,一起来到长寿路上的燎原电影院门口。见到来人,老汪赶紧递上烟,急切地问我人家房子的情况,还将自家房子的草图给人家看。谁想那人看了他的草图兴趣不大,没过几分钟就找借口走了,老汪很是失望,悻悻而归。

过了几天,我又陪他去了一家公园办的调房会。这里人头攒动,场面壮观,不少人将调房信息写在纸上,放在地上,互相寻找合适的调房对象。老汪把自己的调房启事贴在硬纸板上,双手举过头顶。放眼望去,人群里不少人都是这样举着牌子的。调房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:家住中山公园附近的要调到杨树浦去上班,住在大柏树的却要调到曹家渡去上班,那些年的公交车又挤又慢,有的人花费在上下班的时间就要二三个小时,无奈,只能跑到这里来碰碰“额头角”;有的想把房子调到离父母近一点的地方,好让父母帮着带小囡;也有与邻居多年失和的,房子调开,眼不见为净。我俩站了几乎大半天,也有人来聊来摘抄启事上的内容,就是没有人约看房子。回家的路上,站累了的老汪坐在后座上,换我来骑车,他感慨地说:“啊呀,调到一间自己满意点的房子,比娶一个漂亮的老婆还难!”

回家我继续帮老汪刻蜡纸,印启事,夜晚一根根电线杆贴上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不断有人打公用电话给老汪了,想约时间来看房。老汪怕阴雨天上门看房,光线阴暗影响调房,往往特意选择阳光灿烂的日子。事先,他还与左邻右舍打招呼,不要在看房人面前“触壁脚”。这样,几十次的折腾之后,老汪终于与武宁路上一个调房户“对上眼”了,调到了双方都较满意的房子。我依稀记得,还陪老汪去房管所取回了一张表格,登记后就算是办完了手续。搬家那天,我也去帮忙。在“新家”,老汪一家人喜不自禁。老汪先是烧了一壶滚烫开的开水,说是要“财源滚滚”;然后又将水龙头开成一条线,说是“细水长流”;还买了“高升”炮仗,在弄堂里“乒乒乓乓”放着。不少与老汪熟悉的调房人也赶来道喜,老汪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这个小伙子帮了我大忙了!”我也嘻嘻笑着,为他感到由衷高兴。

弄堂旧趣录

一辆三轮车停在小区门口,车上堆满藤编的椅子。像座土黄色小山,高出车身一大截。藤椅用皮带东倒西歪地绑在一起,细细的椅腿和弯弯的椅背推推搡搡地挤着、靠着,好像极不情愿被这样混为一谈似的,各自朝相反的方向倒去。三轮车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佝偻着背,靠在路边的护栏上。天色已经晚了,站在街边就能看见,那些窗口点起了暖黄色的灯,空气中隐约能闻到炒菜的香味。我骑着自行车准备进小区,与藤椅们擦肩而过。橘色的路灯从头顶高高地照下来,三轮车四周反射出一圈柔和的光。那个男人低着头看地面,路上的灰尘被疾驰而过的车流掀起一阵小小的浪花。看样子他是在拉货的途中短暂休息,又或是特意在这里逗留,希望有人会过来看

看他车上的椅子,挑一两把回家。如果现在是夏天,应该会有不少吃过晚饭出来散步的人,可是这个季节,街上只有寥寥几个人缩着脖子匆匆往家赶。那些藤椅要被拉到什么地方去?或许它们是在交付订单的途中,又或许还没有寻到合适的归宿,像大篷车里的吉卜赛人一样四处流浪。我记得小时候外婆家就有一把这种粗藤做成的椅子,是外公专用的。大概用的时间太久了,已经看不出藤条原本的土黄色,包上了一层黑棕色的浆。特别是扶手的地方,经过无数摩擦,藤皮磨没了,只剩下束束散开的藤芯。外婆用红色尼龙绳子把散开的部分缠绕起来,像给藤椅的“断臂”打上了绷带。尼龙绳子又慢慢褪色、断开、分裂成一束束纤维。椅子四

个脚上的藤条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,露出四根光光的木头。虽然这把藤椅那么旧,补了又补,但依然是外婆家椅子界的“顶流”,比其他的塑料椅子舒服得多,难怪成了外公的专座。外公每天大清早就出门,等小孩子们睡醒起床,外公已经买好菜坐在藤椅上喝茶了。外公不在的时候,我们小孩就喜欢爬上去,模仿他的样子,端个茶缸,跷个二郎腿,优哉游哉。藤椅有种凉凉的触感,是温和的,不是冰冷的凉。椅子上所有和身体接触到的地方都被磨得滑滑的,夏天坐在里面特别舒服。单看一根根藤条是又细又软的,可是经过工匠细致而巧妙的编排,一层层规律地交织之后,就变得无比坚韧,还显现出好看的几何图案。小时候,我在赣南老家见过编织师傅做藤椅,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警惕:别被坏情绪牵着鼻子走!

1933年3月,唐大郎以“云裳”笔名为《东方日报》发表《下海记》一文,标志着他由原先捧着金饭碗的银行职员、多年来在小报界玩票的写作者,自此正式“下海”成为新闻从业者。这口报纸饭,用魏绍昌的话说,他笔直地吃了四十年。在文中,大郎谈及当冯梦云离开《小日报》而创

年3月3日,余大雄将原《神州日报》的附刊“文艺俱乐部”独立出来,办起一份三日小报,取名《晶报》。其宗旨是大报不敢登的、不便登的、不屑登的,《晶报》都乐于登,故深得读者拥护,影响力也与日俱增。有意思的是,该报创刊号第三版上已可见到包天笑的身影,即以“小百姓”笔名写《北里收服志》。只不过尚处客串性质,偶尔涉笔。或问他如何与余大雄结识?原来时报馆老板狄楚青是个好客之人,手下编辑陈景韩、雷继兴也是老朋友多,遂“在馆内楼上,辟出一间房子,做了个小俱乐部”,唤作“息楼”,各界人士常来此聊天,吃点心、打扑克、搓麻将,高谈阔论,热闹非凡。包天笑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,很快便与报馆同人及馆外同好搭上报系。若干年后的某一日,余大雄特地到时报馆访问包氏,对他说,日本方面诚邀上海报馆记者赴日访问和游历,由日本各新闻社招待,只是私人社交,纯游览性质。私是由东方通讯社创办人波多博与大雄向各报馆分头接洽,每报馆派一人。包天笑与狄楚青商量之下,便促成前者首次的赴日之旅。但因年长日久,他已记不清此事发生的年月,

包天笑与《晶报》

祝淳翔 包氏(1876—1973),是魏绍昌笔下“鸳鸯蝴蝶派”五虎将之一(虽则包本人并不认可)。1906年2月,他结束了在山东青州的学堂监督生涯,移居沪上,入时报馆当编辑,一干就是十四年,在时报馆算是干了最久的。再来说《晶报》。1919



我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《我的歌唱生涯》。各位大概觉得搞笑了,怎么“生涯”不是配音而是歌唱?其实,我只是想逗我的影迷朋友们乐一乐。歌唱是我的业余爱好,我的水平、条件顶多比五音不全者稍好一点,而且搞七搞八的,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我用的是哪门子演唱方法。之前三十年配音生涯,我是从来不唱的(包括在厂里不说一句上海话),脑子里塞满了台词,无暇顾及。到处乱唱,也是退休之后被那些狂热的好事者硬推上了台,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,最后俨然也成个“歌手”——联欢会歌手(就像我配的《婚礼歌手》中的那一位)。“坏事变好事”,久而久之我忽然发现,我还真应当唱一唱,为老百姓服务可多一种手段,哪怕出点洋相也值。即使人家仅仅是为了听听“佐罗”唱歌而进的剧场,能满足大家一点好奇心,我也挺开心的。

唱得最多的是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,好像成了我的“标志性作品”。也不是因为和这支青海民歌有何特殊缘分,而是被其中一句歌词深深打动:“我愿舍弃了财产,跟她去放羊。”在演唱之前,只要有可能,我会先发表一点感言,尤其对台下年轻人说说,“抛弃财产跟她去放羊”,多好,这才叫爱情。我们从前都是这样的,现在依然是这样。说完,音乐起,开唱。有时也清唱。人说清唱的难度最高,我倒觉得清唱最方便,还可让我天马行空、随心所欲地乱发挥。我当然很在乎反响。多半,一般观众都是客客气气,好心好意给我掌声,热心鼓励;专业的人听了,则不语,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来评估我的唱功。不管怎么说,只要听众高兴,我就心里充满温暖和踏实感。

为了好好唱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,我真有些思考,结论如下:到台上唱歌,归根到底就是唱一份情绪,这跟演员上台塑造角色应当就是一回事。而观众被你吸引、打动的也就是这个。情绪到位了,其他什么技巧、条件或出了点小问题,甚至都可忽略。还是那个中肯的话:做个演员缺乏激情是致命伤。所以每次上场之前,我都对自己说,你准备好了

也记不全同行旅伴都有谁。唯有精通日语的余大雄在旅行中游刃有余的模样,在包天笑脑海中历历如绘。如每次宴席前,主人必有一番演说,我方的答谢词,多交由大雄担任。不难查出,上海新闻记者赴日视察团的具体筹备组织时间,发生在1917年10月,上海新闻界共派出一行十人,完整名单可从12月1日《申报》见到。包天笑在《晶报》集中现身,则要等到1921年3

吗?你上台是否已经带了足够的欲望、情绪,脑子里有画面了吗?遥远地方的那个天,那个地,那个人……

围绕这份业余爱好,这首歌,还有两个小插曲,想在这里与大家分享。

那是一次大型敬老联欢晚会。我上台朗诵后又拉唱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,和大家一起谢幕,回到化妆室。门被谁打开了,我一回头,就见一位很有气质风度的女士快步走了进来,一眼就认出,她是我们熟知、喜爱的老艺术家、歌剧院资深歌唱家任老师,边上陪着的是她同为歌唱家的丈夫,任老师满脸是笑地握住我的手说:“你就这样唱,就这样唱。”天哪,刚才老师就坐在嘉宾席上从头到尾听完了我的唱啊!幸好这个信息事先无人透露给我,否则我在台上思想不乱开小差才怪呢。我深深地感谢任老师,也永远不会忘记老师热情鼓励的话。虽然之后我依然稀里糊涂地唱,但心里毕竟多了一份自信。

还有一次则是发生在最近浦东政协的恳谈交流会上。会开完了,还冒出一个余兴环节。主办方建议我唱一个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,清唱,连报幕也让我包。尽管刚才一大通发言后嗓子有点疲劳,但发挥还算正常,也未因眼皮子底下就有好几位艺术家盯着而心生怯意。晚餐前我被何占豪老师叫住,他很认真地向我发了好几问。他认真地问我,我也老老实实地答。他问:“这支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是青海民歌吗?”我说:“是的。”他又问:“你从前去过青海吗?”我答:“没有。”他看着我,第三句话却戛然而止,未再问下去。我心里发笑,我不追问,亦不可猜到八九分,就是“那种意思”的话,何老师一定是怕太冒昧,会得罪我那不在场的太太,才刹的车。我后来不免自我怀疑起来,难道我的歌声能那样地让何老师产生那种联想?回去跟我太太说了,她听了,也跟我同感,同时,亦感到何大师也蛮好玩的!

人常说:人生苦短。总有一天,我也会出现那种爬不起床的状态。在这之前,我一定好好让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这首歌陪伴在我的身旁。对了,哪位朋友如有机会听我野豁豁地唱,请不吝提提意见哦。

月3日《晶报》创刊两周年之际,当天其长篇社会小说《一年有半》在该报连载,刊头之下署“天笑戏述”四字款,其上则钤有“吴门天笑生”白文篆书印,显得郑重其事。连载至6月底7月初,包天笑又摇身一变,用笔名“拈花”“爱娇”等在该报撰写短文,俨然已成为内稿作者(即主笔)。

那么从何时起,包天笑几乎包揽了《晶报》的版面呢?翻阅1925年钊影楼日记,会发现他常常于一日之内撰写三篇晶稿,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6月初,甚至变换笔名写上五篇,论脑筋之敏捷,笔力之雄健,均令人叹为观止,亦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时评记者的独到眼光与过人胆识。而这一年,唐大郎由北京来沪入外滩中国银行当练习生,每天早晨必买

秋梦中寻梦,秋醒中谛听,那仿佛还是昨夜遥远的,万籁凉声。与呼吸同步起伏,与脉搏共振,在阴郁中开出花,心中伤中结出果,这美丽的旋律,是秋的治愈。秋云下看云,秋风中听风,凌霄薇影依旧披着秋的云裳,閃閃透透,几片涟漪的气息,层层串起秋波,直至汹涌淘尽。放一只翻飞的风筝,用长长的线牵住天地,在高远与辽阔之间,侧耳倾听。秋诗里读诗,秋深里沉醉,身心安放妥帖于榴红蕉黄之中,任一丝丝的悸动,逍遥在小楼碧空。由此及彼的冷暖,值得静静感受。秋的深处,那非凡而诱人的生命乐章,一直在奏响。

秋深 汪洁

七夕会

长长的藤条在他的手中上下飞舞。师傅头也不抬,专注得仿佛整个世界只存在于他的十指间。做一把藤椅的工序很长,先把土藤放在清水中浸泡3-5天,挑选出大小均匀的,拉直后用藤刀破藤,然后刮去表面的颜色。接着用去皮的杉树条钉制出藤椅的框架,对藤条预加热软化,最后是手工编织和上漆。熟练的师傅也要花上6小时左右才能编好一把,是典型的慢工出细活。现在城市家庭里很少看见这种老式藤椅了。长大后,外婆家的老房子拆了,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分成了几个小家庭。再后来,外公去世了,外婆家里的老物件大部分都散落各方,无处可寻,包括那把老藤椅。土黄色的“小山”缓缓地移动起来,我站在窗口看着它,消失在六车道马路的尽头。